

专访香港特区政务司原司长唐英年：

香港唯有努力比别人做得更好

特约记者 芦欢

出生于纺织业世家的唐英年，于美国完成学业后，一直协助打理家族生意。1997年香港回归后，唐英年获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邀请进入行政会议；2002年正式加入特区政府班底，出任香港工商及科技局局长，之后又接连出任特区财政司司长和政务司司长。

2011年，唐英年与新一届香港特首失之交臂。此后，唐英年从政坛隐退，回归家族产业，目前他的角色更多的是商人兼慈善家。当被问及会否再度出山，竞逐2017年香港特首时，他连连摇头，笑言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。
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日前专访了唐英年。他认为，现在特区政府遇到的一些困难，是前几届政府累积到现在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。特区政府应该更多倾听不同团体的意见，在推行政策前多与市民沟通，建立起互信的基础。在谈到对香港未来信心打分时，他给出了7分，他相信香港人有危机感、进取心，无论环境有多困难总能生存下来。

政府应该虚心争取每一张选票

第一财经日报：香港过去一两年，社会矛盾激化得比较厉害，你觉得香港是否出现了管制危机？

唐英年：这届特区政府开局时遇到了较多的困难，过去两年多都很努力地工作，推出的政策也都是市民关心的问题，例如房屋、医疗、教育等方面。为何推出了这么多市民关心的政策，还会面临这么多挑战呢？

首先有大环境的原因，如今全球政府都面临相对艰巨的情况，互联网和新闻媒体带来的资讯爆棚，令市民可以轻易知道政府哪些工作有不妥或遗漏，市民对政府的要求高了，问责多了。

其次这届特区政府理应团结不同党派人士，这届特区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够，让市民感觉特区政府没有在努力团结这个社会。

不同党派为争取选票一定会有矛盾，这些都是浅层的社会内部矛盾，每个社会都是如此。大家都想“攞彩”（获得彩头），让别人尤其是选民知道自己有所贡献，不想自己提了建议却让别人抢到荣誉。

特区政府总部门口的围栏

日报：你提到如今市民对政府的要求高了，问责多了，政府要怎么做才能赢得市民的信任，更好地推行各项政策呢？

唐英年：现在特区政府提出开发新界东北，计划多建一些房屋，让更多的基层市民受益，这原本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，却遭遇很多阻碍。这其实是市民向政府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，由于彼此缺乏互信，如今无论政府做什么事情，市民都会用怀疑的态度来对待，这使得政府很多计划难以推行。政府在推行政策前应该多与市民沟通，彼此建立起互信的基础。

我举个例子，特区政府总部门口新建了一个围栏，没有事先公布也没有任何解释就这么建起来了。大家觉得作为开放性的政府，大门应该是常开的，现在门外建起围栏就自相矛盾了。但开放型政府的深层次意义是政府与市民有契约，政府欢迎市民提出建议，所以周边不应建很多围栏和设置阻碍，可现在市民来破坏政府大门，就等于破坏了彼此间的契约，那么政府就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公共地方。问题是，特区政府本应就此向市民解释，如果政府对外解释不可能任由市民进

行刑事毁坏和侵害公务员同事人身安全，市民应该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政府没做任何解释，市民就会因此感到不满。

日报：有人认为现在特区政府遇到一些困难，是因为前几届政府有很多应该做的工作没有做，这些工作累积到现在，才造成目前的局面，你先后在三届特区政府中任职，对此有何看法？

每个政策制定都有利害

唐英年：我同意这种看法，每届政府都会有些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累积到下一届政府，例如上一届政府没有多一点的建地和早点重建居屋，但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决。

在西方社会，例如美国总统，首届任期一般只会做很少事情，否则会影响连任。因为每次计划推出一个新政策的时候，肯定会有人得益，有人失利，得益人不会出来表扬政府，失利的人肯定会出来骂政府。

所以政府推出政策要分好先后顺序，我担任政务司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西九龙规划上面，遇到的敏感问题之一是，如何确定十几个文化艺术设施的建设次序。为此我们向很多的团体进行了咨询，逐个去平衡，向他们解释我们这样做的意图。几个月后我们听完所有团体的意见后，再重新排列了顺序。由于我们事先做足了准备，推出方案后文化界基本上是接受的。每个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都需要时间和耐性，要有足够的智慧去平衡各方利益。

金融服务业仍是传统优势产业

日报：如你所说，香港社会如今累积起许多的问题尚待解决，这些问题似乎已经影响到了香港的全局发展，拖累香港竞争力下滑，未来香港是否还有机会重振雄风？哪些产业的发展值得期待？

唐英年：金融服务业仍然是香港传统有优势的产业之一，香港在未来五年、十年或更长时间，要继续为国家做贡献，我觉得还是要靠金融服务业。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（国内生产总值）的比重达到46.1%，国家改革开放在下一阶段必然要继续优化第二产业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，向OECD（经合组织）经济体系看齐，这些经济体系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都在70%以上。香港金融业与国际接轨，有国际公信力，未来相信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。

新兴行业方面，有一个香港已经做得很成功，那就是红酒业。红酒与美食相辅相成，在这方面我觉得香港已经做到全球最好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举例来讲，香港的日本菜是除了日本之外全球做得最好的，如果在日本的日本菜100分，香港的日本美食可以达到90分~95分。

可是，你在日本想吃一顿好的意大利美食、中国美食甚至汉堡包都是很不容易的；反过来，你在巴黎虽然可以轻易吃到好的法国餐，但不容易吃到好的日本美食，要是想找地道的中国美食那就更难了。所以论种类和质量，我都觉得香港是最好的。这一产业如今就业人数多了很多，发展亦到了新水平。

努力保持金融中心地位

日报：其实不单是工业产品制造面临挑战，目前中国金融业开放有加快的趋势，香港作为桥梁代理人的角色会否也受到冲击？

唐英年：中国开放人民币服务是在2003年，当时我与任志刚（香港金管局原总裁）先生两人合作默契，设计了一个未来的发展蓝图，要Stay ahead of the curve，也就是说要比别人先走一步，要有前瞻性。我们想出一套方案，要将香港发展为中国的人民币中心，即使人民币将来自由兑换、成为储备货币，我们仍然可以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。

人民币国际化启动之初是由一点进入，以香港作为辐射中心，但现在是全网铺开了，一旦铺开就容易失控。因为人民币还没有完全自由开放，渠道开得越多，可控性就越低。别人如果要冲击一些开放性的货币，到时候你要如何防守。1998年时老虎基金曾经要想冲击港币，当时香港外汇储备有2万亿港元，听上去很充足，但是外面的基金加在一起有几十万亿，如果合力冲击的话肯定很麻烦，当然这样的概率很小，因为有人看空就有人看多，但将来的冲击会越来越多。

不过现在既然已经铺开了，“苏州过后没艇搭”，香港唯有自强不息，努力比别人做得更好。

当然我们的流通渠道比别人大很多，目前处于优势，未来要进一步强化，增强两个股票市场的沟通。

就像现在的沪港通，寻找一个价格发现机制，这对上海的股票市场是有好处的，市场会更加透明、价格发现机制更好。最主要的是明确股票市场的目标，香港股票市场的目标首要是保护小投资者权益，不受大投资者欺负，不被一些信息误导。